

世界历史中的帝国： 超越后殖民*

彼得·邦

哥本哈根大学古典学系教授

* 讲座时间：2017年9月27日。翻译：史庆。

我们可以将帝国放在比较研究的历史框架中，从而在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中审视这个宏大的主题。我们可以用比较研究法来为罗马帝国找到更宽泛的语境空间。本文将首先考察莫卧儿帝国，进而走向更广阔的领域，考察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欧亚帝国。其次，汪晖教授认为，对中国来说，唯一合理的且可以用来比较的是古罗马或者欧洲的民族国家，而这也正是本文要论述的一部分内容。最后，本文还谈及更宽广的帝国历史，包括罗马帝国、中国的明朝和清朝，以及欧洲殖民经历。本文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待帝国，或者说将我们对殖民主义的看法语境化，那么帝国会如何改变？这些更古老的帝国形式，会呈现什么样的更宽广的语境？



海登·怀特（Hayden White）所言是正确的，他说历史只与修辞有关，所以，我们必须从事情的中间开始追溯，而我们要说的这件事的中间就是美国的占领。这一占领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不牵涉战争。当然这并不是真正的全面战争，因为几乎没有超级战争在进行，但后来发生了叛乱。

2004年8月，纳贾夫的一支民兵队伍在反抗美国。这支队伍是什叶派教士萨德尔（Al-Sadr）的民兵组织。他们是叛变的反建制组织，更确切地说，他们是站在什叶派教士组织一边的人建立的，这个民兵组织后来被称为迈赫迪军（Mahdi）。他们成功地占领了纳贾夫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（Imam Ali Mosque）。

伊玛目阿里清真寺很值得一提，那是什叶派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之一。美国人在一年前入侵并推翻了萨达姆政权，该政权由逊尼派穆斯林主导。在推翻了逊尼派政权后，该国的什叶派多数派现在有了机会尝试重申自己的主张，而那些活跃的组织中的一个就是萨德尔的组织。

然而，萨德尔来自体制之外。当时的主要政府机构由大阿亚图拉（Grand Ayatollah）阿里·西斯塔尼（Ali al-Sistani）等人把持——他现在仍活跃在伊拉克政坛。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，作为赢家，他突然在伊拉克获得了更大的声望和影响力，因此他有兴趣与美国人合作。虽然这种合作未必紧密，但他可以获得点什么。

但就在此时，他实际上已经到了伦敦，并声称在那里接受心脏病治疗。他在什叶派内部有一些竞争对手，其中之一就是萨德尔。萨德尔来自一个与其敌对的牧师家庭，他俩的父亲都被萨达姆杀害了，所以，萨德尔不在体制内。

西斯塔尼当时控制着伊玛目阿里清真寺。萨德尔指挥着他创建的军队迈赫迪军。迈赫迪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中救世主的名字。萨德尔常说：“在某个阶段，会有救世主降临拯救世界和人类（尤其是在什叶派伊斯兰教中）。”所以他的军队就号称是救世军，他们占领了清真寺，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，同时也挑战了西斯塔尼的地位，因为后者当时明显没有太大的权力。那么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

像往常一样，美国军队总能赢得战争。美军行动了，当时伊拉克政府只配备了少许部队，他们羽翼未丰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伊亚德·阿拉维（Iyad Allawi）治下的伊拉克政府是一个美军和其领导班子的混合体。他们试图将迈赫迪军从清真寺附近赶跑，但当他们来到清真寺时停止了行动，因为这样做看起来来者不善——他们闯入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，却只是为了抓住一些人。当然，作为统治力的体现，美国人需要与别人合作（这就是问题所在），因为他们希望最终的结果是不需要以军队为基础来治理国家。

毫无疑问，用军事方式来行使权力是最昂贵的，这会耗费大量的金钱，所以必须谨慎地使用军队。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种日常业务模式来让其他人完成工作，那么就需要有合作者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冲击伊玛目阿里清真寺基本上可以表明，“我们”美国人并不真正尊重伊拉克人，更别提尊重什叶派，让那些与“我们”合作的人看看“我们”做了什么。因此，这

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建立联盟的能力，而这是成功占领的必要条件。

美军停止进攻，开始对峙。这是持续一个月左右的围困，直到西斯塔尼从伦敦飞回来才停止。西斯塔尼抵达科威特，并组织车队从科威特出发前往纳贾夫。他呼吁所有伊拉克人帮助他拯救圣殿。无论如何他都要促成一场和平，让萨德尔，或者更确切地说让萨德尔的军队，能够走出清真寺，将控制权交还给自己。一切都可以重建。

纳贾夫有来自外部的占领军，有“大祭司”或阿亚图拉，还有一个社会组织内的竞争对手——另一个挑战权威的牧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和平斡旋能使每个人都挽回面子：西斯塔尼重新控制清真寺；萨德尔取得了小小的胜利，因为他们可以从清真寺里走出来说“看，我们实际上成功地挑战了美国人”；美国人仍然可以与他们合作，因为证明了美国人尊重这座清真寺。所以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每个人都在这个小事件中获胜——当然从长远来看并非如此，但那是另一回事。我们需要注意三个层次的互动：神职人员（大祭司）、外部的占领军，以及来自下层的具有挑战力的神职人员。

二

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，我正在学校教授约瑟夫斯（Josephus）的《犹太战记》。约瑟夫斯是 1900 多年前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历史学家。约瑟夫斯本人来自犹太社会的一个牧师家庭，一直位列反对皇帝尼禄的犹太人领袖之中。公元 66 年，罗马人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部队，他们让叙利亚元老院成员指挥维斯帕先及他儿子提多的军队。他们来到犹太，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伊拉克的情况一样，当罗马军队真正团结起来的时候，犹太人并不能成为什么大的挑战。

叛军很快就逃到了乡下，作为领袖之一的约瑟夫斯被俘虏了。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不是现世的人，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现世影响，但是约瑟夫斯有。在他被维斯帕先士兵俘虏的那一刻，他预言维斯帕先将成为罗马的新皇帝。

如果有一个牧师预言“你”会成为一个新的罗马皇帝，那么突然间这个牧师可能会受到“你”的欢迎，所以约瑟夫斯受到了维斯帕先的庇护，并被带进他的家庭。在那以后，约瑟夫斯在维斯帕先的家里开始体验犹太战争。他写到，由于罗马人已经消灭了大部分的叛乱，罗马皇帝尼禄自杀了，关于谁应该成为皇帝的战争爆发了。成为罗马皇帝意味着拥有军队的指挥权。如果谁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的指挥权，那么突然之间他就有机会成为皇帝。所以维斯帕先决定：“好吧，谁在乎犹太人——我想成为罗马的皇帝，我们将从容消灭叛军，之后让我控制罗马。”因此，维斯帕先从镇压叛乱中抽出时间，成为罗马皇帝。

当时，犹太人留在耶路撒冷彼此争论：“罗马人在哪里呢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们不是快来了吗？”于是他们开始互相争斗。此时的犹太社会有大祭司阿纳努斯（Ananus），他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犹太信仰；他拥有圣殿的钥匙，那是耶路撒冷建筑的骄傲。当时，阿纳努斯控制了圣殿。罗马人在其后等待——竞争对手很快就会来。不久，竞争对手出现了。

一个叫吉斯卡拉的约翰（John of Giscala）的人，他就在被罗马人赶到乡下然后逃往耶路撒冷的众多武装之中，开始取得领导权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所谓狂热者的出现，真正的宗教狂热者生活在一个神圣的王国——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迈赫迪军，他们以救世主命名，声称将创造一个公正的世界，如此等等。狂热者认为上帝会在地球上建立他的王国，这一时刻就快到了。

他们是真的狂热分子——决不妥协。突然间，吉斯卡拉的约翰和狂热者开始在耶路撒冷周围组织发动袭击。狂热者占领了圣殿——这个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被占领了。掌管圣殿的大祭司命令他的军队尝试夺回圣殿，

他们首先占领了圣殿周围的外部庭院。但是当他们来到最神圣的圣物所在的内殿时，阿纳努斯命令他的军队停下来，因为作为一个大祭司，他不能冒险让犹太人的血溅到最神圣的区域，这会削弱他在犹太社会的地位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样做会亵渎上帝，玷污他本应该维护和捍卫的圣殿。所以，他决定，最好是围攻他们，也许他们会出来。但接着，吉斯卡拉的约翰说：“我们之中有狂热者，而对手阿纳努斯就在外面——虽然他做得不是很好。如果我能够很好地指挥狂热者，那么起义就能成功。”

因此，他设法促成了与狂热者的联盟，然后策划了一个阴谋。他们在晚上起义，意外地抓住了阿纳努斯。阿纳努斯和许多其他体制内的神职人员被杀，吉斯卡拉的约翰和狂热者控制了耶路撒冷。此时，罗马占领军在外，大祭司在内，而“虔诚的军队”占领着圣殿。

所以我讲授的事件就像2004年8月在纳贾夫所发生的一样——这种模式非常独特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们读过约瑟夫斯的书吗，这些人决定要重现历史？可能并不是这样。但是，这里有一些很有趣的结构性问题，这值得我们不仅从狭窄的殖民主义等概念的层面去学习帝国，而且还要去扩大它，以宽泛的历史视角来研究，因为这些相似之处是发人深思的。

三

总结可以得出帝国权力的三个基本原则，或者称之为三个矛盾，这可以说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以上情形所展现的三个基本矛盾。

第一个矛盾是军事上的。如果可能，罗马历史学家总会很高兴地引用马基雅维利（Machiavelli）的话——人们不曾错过任何机会。马基雅维利指出，我们可以用军队征服一个地区或省份，但我们不能用军队来统治，使用军队非常昂贵。但这也是一个矛盾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用以建立帝国的工具，并不能用来真正控制它。大多数人会陷入一种治理矛盾，或

许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：需要找到与当地合作的各種不同方式。但问题是，当地人很少对帝国百分百忠诚；他们要求的事项往往不一致。例如，西斯塔尼是与美国合作最紧密的人，他的要求是在伊拉克境内进一步推进什叶派伊斯兰教，而美国人则认为他们在引入民主。

这很清楚地证明了帝国的矛盾：他们基本上只能依靠那些与其利益部分有重合的集团来治理。法国外交部部长谈到美国是一个“超级强权”的大国，即它的军队非常强大，但由于不能以军事为基础进行统治，结果就是帝国将在非常严格的约束下运作，帝国是脆弱的。帝国可以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，但是当它遇到一个侵略者的时候，帝国的作为将很有限，比如，中东仍处于混乱和无序之中。

在意识形态上，这个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大多数帝国都想推广的一种普遍观念。罗马人认为他们在创造一种新的罗马世界，但后来他们发现必须尊重当地的特性并与之合作。例如，罗马皇帝通常会以自己的名义在耶路撒冷圣殿前献祭，以支持犹太信仰。但后来他们背叛了他，他不得不拆毁圣殿，但之后他又开始与其他犹太人如约瑟夫斯合作。约瑟夫斯写了关于叛乱的历史——那段生活在维斯帕先旧城区的历史。维斯帕先后来成了皇帝，搬到了皇宫，他的旧联排别墅现在成了约瑟夫斯的住所。可以说，约瑟夫斯的历史向人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：“犹太人确实反叛了，但他们是坏犹太人，是罪犯，如此等等。”有一部分真正负责任的人说——相信我们，我们会让危机妥善解决。但当然，他们只能半途而废，因为有一部分同样应负责任的人实际上发动了叛乱。所以在普遍主义和当地历史及传统之间总是存在这种紧张关系。这里就存在三个矛盾。

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，但这些矛盾或困境事实上无法真正得到解决。每个帝国都必须处理这些矛盾或紧张局势。一个帝国如不能解决这些问题，那就不再是一个帝国了。它必须平衡不同的对立面。此外，我还提到了马基雅维利、甘地，因为甘地可能是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人之一。他清晰地作为构建帝国的必需的合作要素理论化了。他关于反抗英国殖

民军队的观点是：“听着，我们不能在战斗中打败他们，这真的不重要，我们只需要坚持我们不合作。那么英国的统治就将消失。”也许他说得不对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帮了不少忙。但需要说明的是，合作在这方面非常重要，而这意味着帝国是一个“混乱的东西”，它总是充满妥协。

四

所以现在我想尝试探索这些矛盾能告诉我们什么，或者，从帝国的长远角度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它们只是一个“奇怪的巧合”吗？我不想成为一个社会科学家；我不想说帝国是永恒的。但我认为我们需要理解帝国的一些结构性的相似之处，这些相似之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慢慢成形，但也需要有所连接。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。在人文学科，我们被告知需要学习一切细节，细节是最重要的——但是有一件事被人文学者完全忘记了，那就是大部分的人类存在很平凡，这也意味着历史是很平凡的。所以，即使我们有时谈论的平淡的真理非常重要——因为这样的谜之细节可能花了十年才被挖掘出来——但也许它本身并不重要。因此，在如此丰富的历史中，有一些关于平凡的东西是可以被言说的。

所以，我们需要一些理论来帮助我们熟悉帝国。但问题在于大多数帝国理论都诞生于后殖民时期，或者是基于 20 世纪欧洲的经验。许多理论认为帝国在本质上已经过时，帝国即将从世界上消失。每个人都能看到欧亚大陆各帝国的政权已病入膏肓，特别是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。它们需要现代化，否则它们会分崩离析，就像奥匈帝国或者奥斯曼帝国那样。

这是过去的事情，我们会看到帝国分裂成国家——所以没有普遍主义，只有特殊主义。实际上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大多数历史学科都是以特殊主义原则为基础的；我们想研究特定的社会，比如丹麦、中国以及任何其他地方的国家。然后，当研究开始深入，我们就会发现背后有一个更复杂

的故事，而不仅仅是它们分裂成国家以及帝国的消失。

其中一个例子当然是中国，正如我从汪晖教授的著作中学到的，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概念并非通过分裂，而是在帝国的层面上重新构建。在欧洲或后殖民理论中，我们看到的通常是帝国的分裂和被遗忘。当然，我们看到俄罗斯并没有分裂，这个国家提升到帝国的地位，并成功地接了棒。

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宽泛的历史，而唯一的方法就是融入历史。但在做之前，我们也会做一些定义；我只是想排布一些大家都同意的基本内容。什么是帝国？就是一个政体的统治和控制形式，通常是一个国家，尽管它可能会突然超越一个或多个政体而成为国家的敌人，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统治着许多政体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通常我们看到的是主权概念下的现代国家，国家即主权。成为主权意味着国家自治，不受其他国家的支配。从近代早期的欧洲宪法论述来看，人们谈论的是君主如何在他自己的王国里成为皇帝（没有人在他之上）。现代宪法规则并不擅长讨论等级制度，它通常只在原则上讨论主权。主权是平等的，但实际上，等级制度仍然存在于我们之中。这就是帝国的意义：政体和国家的等级制度。

我们会看到那里的主权更像是分层的。德国宪法学者塞缪尔·普芬道夫（Samuel von Pufendorf）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，他在17世纪提出了主权的概念。他意识到一旦采用了主权话语，帝国就成为一种遗产。帝国有分层的主权以及混合的安排，所以他从主权话语的角度来理解帝国（精通他的理论的人可能会说我几乎曲解了他的理论，尽管我只是想用另一种说法来对它做出解释）。

这种非正规性使得统一的理论很难建立起来，实际上我们只能将帝国的某些方面理论化。所以如果我想到了帝国，我就会想到社会学的理论，这些理论认为社会权力的源泉根本不存在，社会权力没有一个原则，但有四个维度：经济、政治、军事和意识形态。帝国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这些权力层，但因为它们是复合的，所以任何人都不能统一它们。另一种说法是为了提醒我们关注波斯人对帝国的概念，他们将帝国视为帝王统治者、万王

之王；世界上有很多国王，但只有一个超级国王。请记住这位超级国王，因为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他。

五

如果现代化理论只是部分正确，等级制度在我们的世界里仍然重要，那么我们就需要超越“欧洲经验”，但是我们在不会将欧洲经验或殖民主义解释为一种阴谋——它需要被铭记、思考和反思，但它也需要被语境化，而这正是为了克服我所说的“高度经典现代化的学术视野”（intellectual horizon of high classical modernity）。在那里我们将关注点从帝国转向主权国家，我们将从一个文明转向一个国家——历史有明确的方向。

最后一个认为历史有明确方向的人是美国知名学者弗朗西斯·福山（Francis Fukuyama），他认为历史在1989年走到了尽头。然而，当我来到中国，环顾四周时发现，“历史”几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那时我在杭州的浙江大学，我的助理跟我说我要住的地方，她指着那幢建筑说：“哦，那是幢古老的建筑！”而那栋建筑建于20世纪90年代。

所以，当我们在中国旅行时，可以看到“历史”实际上正在飞速运行，它当然不会结束。也许在欧洲事情发生得有点慢，所以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黑格尔主义，或者其他任何主义中，历史都没有那种曾经被经典现代化理论总结的单一方向。我们都必须有更宽广、更“散乱”的历史观。另外，我还没有讲到哲学史——这是研究世界历史的古老方法。但与此同时，事实上，很多历史学家已经不再停留在“我们只是想研究特殊主义”的阶段了；我们还想研究世界历史。所以，自1989年以来，有一个巨大的、关于什么是“历史”的话题开始发展。我承认，现在有较好的、关于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的经验概念——我们不必依赖于黑格尔的蓝图，例如他关于“逻辑上人类社会的自然发展”，抑或亚当·斯密（Adam Smith）